

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党的纪律建设新理念

——习近平关于党内规矩的重要思想论析

郝保权

摘要：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创新。它有着深刻的逻辑基础，是基于对中华民族规矩意识的传承和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历史遵循、基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视角的政治生态学理论所证成以及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现实需要。过去不代表不在场或失去话语权，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精髓要义仍突出表现在崇尚学习，善于总结工作经验；谦虚谨慎，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牺牲的革命精神；注重组织观念，倡导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等方面。同时，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面临着现代转换问题，要妥善处理其与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等意识形态的支撑关系；要坚持以上率下，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模范带头遵守规矩；要注重结合运用党内其他制度和机制保障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纪律建设；党内规矩；非正式制度；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18)02-0016-10

严明的纪律和规矩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一切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强有力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具鲜明特点的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重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把纪律挺在前面”，使之成为全面从严治党之“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领”、全面深化改革之“舵”、全面依法治国之“率”，不断开创党的纪律建设新理念、新境界^[1]。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14次言及“规矩”一词，并首次明确系统地阐述了党内规矩的范畴。他指出，“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其具体内容包括“其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其二，党的纪律

是刚性约束；其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其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内规矩范畴的擘划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党内规矩范畴具有两大来源：一个是成文的、刚性的规矩，即党章、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这些党纪国法纲举目张，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纪律体系；另一个是不成文的、相对柔性的规矩，即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它们同样是中国共产人行为规范的重要遵循。而且，把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理论创新，它对于规范政治主体行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淳化政治习性、优化政治环境等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坚持和发展、完善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使之成为柔性纪律融入到

基金项目：陕西省高教工委规划教材项目“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论”，项目编号：2017JC01；中央高校人文社科基本科研业务基金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民主集中制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G2017KY0209；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契合与实现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郝保权，男，陕西靖边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党的思想文化和日常行为当中, 在纪律建设中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和功能, 从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是一个意义重大、亟需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的逻辑基础

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党内规矩范畴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着深刻的逻辑基础。它是基于对中华民族规矩意识的传承和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历史遵循、基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视角的政治生态学理论所证成以及中国共产党政党建设的现实需要。坚实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 从而为党的纪律和规矩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 基于对中华民族规矩意识的传承和发展

“规矩”一词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具有重要地位。“规”“矩”本是画圆和方的工具, “圆者中规, 方者中矩”。后来词义演变, “规矩”逐渐成为了“准则”“法度”的代名词, 与“准绳”“绳墨”之义相通^[3]。几千年来, 规矩意识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 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族群心理、意识和价值取向的组成部分。韩非子有云: “规矩既设, 三隅乃列”; 孔子曰: “己不正焉能正人, 己心不安焉能安人? ”; 孟子道: “圣人既竭目力焉, 继之以规矩准绳, 以为方圆平直, 不可胜用也”“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吕氏春秋》写道: “欲知平直, 则必准绳; 欲知方圆, 则必规矩”; 宋代宰相吕公曰: “规矩备具, 而能出于规矩之外; 变化不测, 而亦不背于规矩之外。”……由此可见, 规矩作为传统社会中的公序良俗, 具有秩序、规范与整合的作用。它成为中华民族上至贤人志士、下至普通百姓的集体认同和共同操守, 随处可见于各种典章制度和乡规民约当中。而且, 规矩比法律的作用更加广泛,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生活中秉承的原则, 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要遵循的礼仪准则^[4]。规矩犹如阳光和空气一般, 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伴随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融进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规矩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把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的深厚历史积

淀。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 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又是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 能够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进一步发扬光大。此外, 它还具有两项重要意义: 一是从外延上看, 把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 扩大了党的纪律建设覆盖面, 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和政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从内涵上看, 把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 为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划定了明确的“方”和“圆”。一方面, 它用各种具体的要求画框, 建立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 它也用各种限制为党员干部画圈, 使之不能逾越这个范围, 从而为广大党员干部提出了明确的行为界限。

(二)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历史遵循

没有规矩就不能称其为政党, 更不能淬炼马克思主义政党崇高的精神品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看重无产阶级的纪律性, 并认为在大工业生产中所锻造出来的无产阶级的这种品质特征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看重党内纪律和规矩对党员的要求, 并时刻把守纪律、讲规矩作为客观的标准严格遵照执行, 以此锤炼自己的品行。在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把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作为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 肃清了党内存在的不良思想影响, 成为党的建设史上一个伟大创举;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 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挚拥护和欢迎; 刘少奇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也是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扬党内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光辉典范, 他强调共产党员要“学习、提倡并发扬党内一切好的模范和正气”, 体现了共产党人应该具有的党性修养和行为自觉; 革命胜利前夕的西柏坡, 更是一个立规矩的地方, 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完善的动力源泉, 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并且其内涵在不断

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邓小平的着重点在于从制度上建党；江泽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胡锦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习近平主抓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开展党内纪律和规矩集中教育活动，真正让纪律严起来，把规矩立起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届五中全会讲话中所说的那样：“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守。”^[5]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坚持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使所有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断培养良好的行为品质，确保我们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

（三）基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视角的政治生态理论证成

制度是约束和激励人们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并被人们所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一系列规则。根据这些规则的存在形式，制度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分。它们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既对立又统一，在政治生活中共同发挥作用。党章、党纪、国法等作为硬性约束，属于正式制度；党的优良传统与工作惯例作为软性内容，属于非正式制度。作为政治生态组成部分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它们之间存在着形成机制、保障机制、演进路径的不同。在形成机制方面，党章、党纪、国法等具有严格的程序，须经过制度制定者认可，而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经过党长期的宣传和提倡所形成的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互动过程；在保障机制方面，党章、党纪、国法等具有强制性，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维持机制在于自我约束；在演进路径中，党章、党纪、国法等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很快做出调整，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则具有超稳定性，只能缓慢改变^[6]。

以上诸种不同说明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各自有不同的作用，不能相互替代，但同时也反衬出两者之间可以相互统一、相得益彰。这主要表现

在：其一，党的纪律和规矩可以相互依赖。党章、党纪、国法等正式制度要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础，否则就无法完善实施，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作为非正式制度要以正式制度为保障，否则就会产生消极作用。其二，党的纪律和规矩可以相互补充。这是因为党的纪律不可能面面俱到、穷尽所有情形，这就需要党内规矩作为补充，实际上党的纪律往往是原则层面的，而党的规矩多是操作层面的，两者之间完整一致才能达到实践中的和谐统一。其三，党的纪律和规矩可以相互转化。党的规矩作为非正式制度，它促使政治主体形成政治习性、达成行为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加自觉地遵守纪律规范。

因此，从政治生态学视角来看，我们一定要运用系统的、生态的、联系的、非线性的观点去看待政治体系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不可偏颇^[7]。对于党内成文的规章制度，党历来很重视，能够做到及时把党的纪律建设的经验转化为成文的制度规定。而对于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种软约束和自律要求，长期以来都被人们忽视了，现在要强化这方面意识。其实正式制度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党性与对党忠诚度的重要考验，而非正式制度更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党性与对党忠诚度的重要考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内规矩有的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但作为一个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懂的。不懂的话，那就不具备当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觉悟和水平。”尽管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这些规矩看着没有白纸黑字的规定，但都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8]。

（四）基于中国共产党党建的现实需要

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也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党建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经过九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人不以规矩则废，家不以规矩则殆，国不以规矩则乱”。党内纪律和规矩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治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如果能够带头守纪律、讲规矩，起到表率 and 领导作用，那么就可以很快在全社会形成良好风尚，不断激发共产党员的政治正能量。这种

政治正能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内生权威，它是我们党要获得长期存在和长远发展所必须具有的吸引力、凝聚力与约束力，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培厚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同与向心力，才能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完成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

从现实诉求来看，中国共产党党内还存在着破坏纪律和规矩的现象，这些现象主要表现为：缺乏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原则面前不坚定；妄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言辞论调与党中央不一致；自身党性修养不够，党员纪律观念不强；热衷于立山头、编“关系网”，搞“圈子文化”；做政治上的“双面人”，在行动上与党离心离德；经济腐败，将党内纪律和规矩视作可以随便拿捏的“橡皮图章”；自由主义倾向严重，集体主义精神不足；或者将党的纪律和规矩视为形同虚设的“稻草人”，导致党内纪律和规矩失之于宽、失之于严，等等。以上诸种现象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政党建设任务，它是中国政治深入发展的必然逻辑，是中国政治走向清明的历史自觉。而要解决好所有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切实解决好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抵制一切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侵蚀。因此，我们一定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融进血脉、注入灵魂，匡正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言行，高悬纪律和规矩戒尺，使之真正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和政治本色不褪。

二、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的精髓要义

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凝结而成的，由于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尽相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内在的精神内涵。具体而言，外在表现形式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这些精神都是党的优良传统在不同时期因应时代需要而表现出的不同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党内出现的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

流失的状况，大力弘扬以下几种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对重塑党内规矩的纪律性和约束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作用。

（一）崇尚学习，善于总结工作经验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建党兴党的重要方略。中国共产党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诞生的。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一批诸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先行者，在当地的共产主义学习小组中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提出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比较，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会后，毛泽东要求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全党“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所以，党从1939年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学习运动，1942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整风运动。革命即将胜利时，“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即有“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要求“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9]新中国成立后，党始终高度重视学习，并有组织地进行学习，进入21世纪，2002年12月，十六届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集体学习，这标志着集体学习制度正式建立。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重申毛泽东在1939年提出的“本领恐慌”问题。理论上的成熟是党员和领导干部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忽视学习，放松主观世界的改造，是党员和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甚至破坏规矩和违法犯纪的重要原因。因此，新形势下全党要大兴学习之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党的这条优良传统弘扬好。

（二）谦虚谨慎，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始终强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同时倡导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还把忧患与勤政相联系，总结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宝贵经验。作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著名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章论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看过《甲申三百年祭》后，把它列为整风文件，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要求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致信给郭沫若：“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10]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召开这次大会的时候，党的历史问题解决了；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内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将来更有希望”，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光明多得很”。但是，毛泽东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却强调要“准备吃亏”，并一口气列举了可能会遇到17条困难。1949年3月，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已经是不要很长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了，然而“因为胜利，党内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毛泽东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1]。

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时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样如此，“不当李自成”的话题常说常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又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增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自觉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我国在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淡薄了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在前进的道路上，困难和风险的出现，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难以

避免的。因此，全党必须坚持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谦虚谨慎和保持忧患意识的优良传统，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延安时期，党通过整风运动，成功地克服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极大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

延安整风中，党总结了历史上曾存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党内斗争原则。如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呢？那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2]在整风中，要求党员和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阅读整风文件，联系自己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照检查、反省自己，弄清了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最后提出了努力的方向。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过程中，尤其强调自我批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升华为一种精神，融入党的血脉，成为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锐利武器，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因此，毛泽东于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把“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列为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

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和党风。然而在一段时期内“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的少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评功摆好会”^[13]。针对这些问题，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河北省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本

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使用、经常使用这个武器，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习近平多次强调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用好，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还是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以及“两学一做”活动中的民主生活会与党员大会做到“红红脸，出出汗”以达到“排排毒、治治病”的目的，这正是对整风精神，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的发扬。

（四）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牺牲的革命精神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历史。比如在延安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14]。面对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我们党依靠根据地广大军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度过了难关，最后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艰苦奋斗的“艰苦”与其说是指条件或环境，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主要通过刻苦的思想、艰苦的作风和顽强拼搏的工作来展现。因此，艰苦奋斗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永远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过时。

党正是在艰苦奋斗中密切联系着群众，在艰苦创业中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当经常“洗脸”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弘扬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孺子牛”，为党和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直在强调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优良传统，他指出：“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16]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当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节假日要自觉坚守岗位”，指出节假日能自觉坚守岗位，也是一种规矩。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这个问题：“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17]

（五）注重组织观念，倡导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一条基本原则。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列宁和马尔托夫围绕党章第一条发生了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建立一个组织分散、成分复杂的政党，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18]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员参加党的一定组织，积极为党工作，个人服从组织始终是我们党明确的政治规矩。1948年，解放战争开始打得比较顺利时，党内无纪律倾向有所抬头，作决策不请示报告的情况屡有发生。为此，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会议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党的下级的重要决议必须呈报党的上级组织批准以后方准执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将不同意见的争论，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必须报告中央。党员和下级组织的活动要向组织和上级组织报告，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非常明确的党内规矩。

有组织观念，办事讲程序，彰显着党的组织纪律，凝结着党的工作规律，维护着党的权威和工作秩序，按程序办事就是按规矩办事。党员干部只有懂得组织运行的程序，明确自己的权限，才知道纪

律的红线在哪儿、不至于破坏规矩。正如习近平所讲的“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19]。针对党内在请示汇报、组织程序观念等方面存在的不少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汇报，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20]。同时，习近平强调：“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把有无组织观念、是否遵守组织纪律提高到党性的高度，“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21]。

三、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的现代转换

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作为党长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富，是党健康发展的有机成分。长期以来党注重倡导、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作为精神层面的价值去弘扬，充满了理想色彩光芒，没有作为政治纪律和规矩来确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种思潮兴起，各种理念传入，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受到侵蚀，包括党内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对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开始不够重视，如果长此发展下去，任凭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成功经验和伟大精神削弱，必然会消解党的肌体，削弱党的权威和影响力，必将导致党的纪律性和严肃性大大降低，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下降。只有创新党的建设，严肃党的纪律，根据形势需要，从微小处着眼，充分利用各种要素，整合资源，管党治党，才能够进一步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处在不断生成和发展当中，因此，是一个历史性范畴，每一具体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均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形成，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党的活动精神的概括，势必打上了一定的时代烙印，这是其历史价值。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要与属于正式制度的成文的党内法规相匹配与适应，必然存在一个现代转换的问题，这样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现代价值才能彰显。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的

历史起点上，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在管党治党中发挥其功能和作用，既是继承与弘扬的过程，更是发展与转化的过程。因此，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时代精神，发掘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现代价值，使其发扬光大，推陈出新，更好发挥作用，须着重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弘扬和发展需要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等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本就是党的性质、宗旨和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和反映。弘扬优良传统，就是坚持党的核心价值，以党的核心价值为支撑，就抓住了弘扬与发展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内核。在革命战争年代，不管敌人多么强大、环境多么险恶，无数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靠的就是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在中国以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符合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22]何况做自我批评。正是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才敢于真正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同志也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在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党员和领导干部就会破坏规矩，“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23]。所以，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必须坚持党的思想建设，党员只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才能真正传承和发展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第二，弘扬和发展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必须坚持以上率下，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模范带头遵守规矩。在党内，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既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本身也是一种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守纪律、讲规矩必须从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党的领导干部，要模范遵守党的规矩，通过榜样的言行，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崇高精神和良好行为规范具体化、人格化，从而增强优良传统传承和工作惯例的吸引力和有效性。一个榜样就是一面旗帜、一批榜样就是一种风气。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

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倡导者，培育者和实践者。毛泽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倡导者，也是这一宗旨的践行者。比如延安时期的“只见公仆不见官”优良作风的形成，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前辈抓出来的，更是带出来的。毛泽东在听到“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骂声后，并没有“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是深入研究财政经济问题，最后“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当今要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必须坚持以上率下。“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习近平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率先垂范，然后层层制定、提出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首先从中央政治局做起，逐条落实、不折不扣落实“八项规定”等规矩，以上率下、示范全党，所以才开创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新局面，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第三，在弘扬和发展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同时，注重党内成文纪律的建设，用党内其他制度和机制保障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传承。正如上文所述，不成文的规矩与成文的规矩作为党内规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者存在着不可或缺的互补性，二者相互转化。优良传统与工作惯例只有不断与时代发展、任务使命、党员实际紧密结合，创新内容形式方法，才能不断增强传承针对性、实效性。因此，要及时把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转化为党内成文的规矩，通过“立明规则，破潜规则”，从而“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有力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等都有相关规定，这些党内法规的明文规定，正是对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传承、转换和发展，将大大有助于推进党的纪律建设，从而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

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有效途径。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既要依靠重拳反腐败斗争、“三严三实”活动、全面从严治党等祛除党内不良现象，

也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遵循良好的工作惯例，这是党的纪律建设新理念。自觉培植和践行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使广大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是与党的性质、宗旨、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相适应的一系列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中国共产党人与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密不可分的，这是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体现，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需要传承和发扬的优秀品质和行为习惯，是共产党人的营养品和精神灵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党中央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彻底纠治“四风”“两学一做”等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广大党员在此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洗礼和灵魂陶冶，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树立良好形象，将党的规矩意识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不断开创着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既是共产党人的重要遵循，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同时，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只是开端，还需要建立长效机制，使之成为广大党员的人格力量、示范准则和自觉行动。在当前形势下，广大党员应该加强党性修养，把牢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树立崇高的精神追求，使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成为共产党人的“标配”。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并不是表面说辞，而是源于落实落细的尺寸之力。只有从细节出发，始终不失小节，才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彰显共产党人的楷模风范。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坚持和遵循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才能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品质，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坚定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使广大党员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而不懈奋斗。因此，坚持和遵循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优化党内作风、规范党内纪律和解决党内各种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必须长期重

视并加以落实的重要行为指南。广大党员干部只有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才能在新时代有新担当和新作为。党性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 牢记共产党员的本心, 才能百炼成钢, 维护好党内政治生态, 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同时也要牢记, 初心易得, 始终难守。要真正坚持和遵循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需要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作坚决的斗争, 要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 打破党内生活的不良惯性, 涤荡党内不良政治文化风气, 应对各种挑战和考验。把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纳入规矩范畴为党的纪律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广大党员干部要彰显独特的资源优势, 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参考文献

- [1] 李斌雄, 张银霞. 中国共产党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利益基础和生态分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1): 27-37.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119.
- [3] 丁喜霞. “规矩”及相关词语的衍生和演变[J]. 南京社会科学, 2004(6): 85-88.
- [4] 刘红凛.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党员干部要懂得讲规矩[N]. 辽宁日报, 2015-04-07(1).
- [5] 人民网.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15-01-14(1).
- [6] 武星. 依规治党: 论中国共产党“正式规矩”和“非正式规矩”[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8): 11-15.
- [7] 陈朋. 纪律规矩建设的政治生态学考察[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9): 144-151.
- [8]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7.
- [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80-1481.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227.
- [1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38-1439.
- [1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96.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353.
- [1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92.
- [1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96.
- [16] 习近平. 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N]. 人民日报, 2013-01-06(1).
- [17] 习近平.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05-03(2).
- [18] 列宁. 列宁全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252.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101.
- [20]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41.
- [21]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39.
- [2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096.
- [2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106-107.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the Rules: a New Concept of Par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oughts on the Rules of the Party

Hao Baoquan

Abstract: It is a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incorporate the party's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into the rules. It has a profound logical foundation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s sense of rules, the historical follow-up of the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past does not mean absence or utterance right. The essence of the Party's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is still prominent in advocating learning, being good at summing up work experience; being modest and cautious, having strong sense of urgency; going on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and being strict inner-party political life; doing hard work, being busying in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of sacrifice; being buried in organizational concepts, and advocating the collectivist values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arty's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are also facing the problem of modern transformation. We must properly handle its ideological suppor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arty's ideals, beliefs, and purposes. The leaders in our CPC, especially the leading cadres of the Party have to set a positive example to the cadres of grass-roots unit.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use of other systems and mechanisms within the Party to ensur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s and work practices.

Key word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arty Rules; Informal Institutions; Modern Transformation